

路径演化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大转型： 兴衰探源与历史比较

王津津 任保平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构建“制度适宜性调整——技术进步方式转换——经济结构动态转变”理论解释框架,从中国经济大转型的路径演化过程探寻增长表现兴衰转化的深层动力。研究认为:路径生成、稳定与分化阶段均可能孕育出经济转型的路径构建机会,只有当各个环节形成匹配合力时,经济转型才能够顺利实现;历次转型之间内含的递进逻辑与累积效应,会借助自发演化趋势与思想模型修正的相互作用,在矛盾生成、消解过程中予以传递,进而催生出不同经济转型之间路径演化的阶段性差异;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认知协调,理论探索与经验实践的创新结合以及开放系统下的多方位互动等内容,共同构成中国式经济转型增长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 路径演化 转型比较 适宜制度 技术进步 结构转变

王津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710127

任保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710127

一、引言

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学领域中最令人着迷的问题,无论是从横向维度对国家间贫富差异生成及其趋同机制的探讨,还是从纵向维度对增长源泉与贫困根源的追溯,世界经济发展多样化、不平衡的演进路径总能为其提供丰富的案例资源与理论修正契机。中国经济的兴衰转化轨迹不仅构成世界经济增长史范畴无法回避的独特案例,同时也是一个既能挑战传统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又能持续引发学术好奇的宏大命题。

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显化为一系列大概率状态的阶段性转换。17世纪之前的中国领先于世界发展趋势,无论是人口规模、科技发展状况还是人均收入水平均呈现出绝对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5ZDA012)阶段性成果,并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13JBG014)资助。

的主导力量。受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贸易探险等一系列链式反应的催化,欧洲大陆在孕育出工业革命并实现自我崛起的同时,触发了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冲撞与对抗。伴随着东西方制度分叉、科技分化与经济分流现象的不断加剧,由盛转衰的中国经济引发了学术界对“李约瑟之谜”的启示性发问。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仁人志士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下发动了一系列变革,借助产业扩张、科技革新、资本流动等先行国家的增长新动力,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系统内嫁接了工业化与现代化成分。但是新兴社会逻辑的萌芽在为经济复苏带来新机遇的同时,并未成长为足以复兴中国经济的源动力,反复陷入混乱但又不时出现实质性增长的经济表现始终未能摆脱“中国近代停滞之谜”的命题定位。随着20世纪中叶新中国的全面建立,“国家重建式赶超”理性共识下工业化、现代化的大规模推进,以及对社会、经济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促使中国经济跃过重重困难开启了复兴之路。而在渐进式改革开放的历史选择下,中国经济随即步入高速增长轨道,实现了从衰退到复苏、从贫穷到小康、从落后到进步的历史遗愿,并创造出世界眼中的“中国奇迹”及其派生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时代新命题。

中国经济几经沉浮的历史史实不仅孕育出了中国式发展道路的经验与教训,也暗含着由一系列经济转型递进逻辑驱动的历史兴衰大趋势。本文着眼于超长期、动态化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大转型路径演化过程,试图重新构建理论解释框架,在还原经济表现兴衰转化形成逻辑、比较路径演化阶段性差异的基础上,总结中国经济转型道路的历史启示。既是为了避免放大某一次转型的历史价值而人为破坏转型之间的内在逻辑,也是为了在尊重自然演化规律与人类理性创造力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大转型进程中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力量,更是为了合力规避“消解过去”、“否定现在”惯性思维下割裂历史演进、对立历史阶段的研究缺陷^[1]。

二、路径演化视角下中国经济大转型的理论解释框架

从路径演化视角研究中国经济大转型,需要将其看作由一系列路径生成、路径稳定与路径分化三个环节^[2]相互继起的经济转型路径集合,在串联历次经济转型的基础上,考察影响经济兴衰转化的众多因素在不同时段内的相对变动趋势与具体作用,通过历史比较发现经济转型过程的一般性与异质性规律,形成属于中国经济转型道路的经验启示。

1. 制度构架的适宜性调整促使经济转型路径得以生成

行为主体对既有制度构架适宜程度的差异性认知判断与调整能力,构成经济转型路径生成的两种极端类型:其一,由“历史微小差异”驱动的“无意识”回应行为触发转型路径的涌现机会,汇集成原有制度构架的“非遍历性”调整动力,在自增强机制的作用下引发路径依赖;其二,由“策略嵌入”驱动的“有意识”偏离行为创造转型路径的构建机会,汇集成原有制度构架的根本性调整动力,进而启动原始路径选择集以外新路径的创造。一般情况下,转型路径的生成阶段是上述两种适宜性调整动力共同引致制度构架发生变迁、不断形成新均衡的动态过程。从不同时空维度下适宜制度构架的核心组成部分来看,代表特定政府形式与治理者权力分布的政治制度以及规范主体经济动机与行为选择的经济制度^[3],能够通过其衍生出的政治发展战略控制合法性机会窗口,经济发展模式构建行为决策机制、文化发展手段创造适宜性预期,进而对资本积累偏好、行为与途径等内容形成特定的激励导向。

[1]贺新元:《辩证思维下的“中国道路”解读》,〔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

[2]Sydow, J., A. Winderler, and Møllering, G., et al.. Path-creating networks: the role of consortia in processes of path extension and creation. 21st EGOS Colloquium, Berlin, Germany, 2005, 345-368.

[3][美]达仁·埃塞姆格鲁等:《制度: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南京〕《南大商学评论》2006年第3期。

因此,转型路径的生成阶段既是新一轮制度构架适宜性调整、自增强并有可能跨过“临界”锁定均衡状态的开始,也是经济增长资本积累激励机制重塑的契机。

2. 特定技术进步方式的形成促使经济转型路径趋于稳定

既有制度构架既可能在自增强机制的作用下进入“锁定”状态,并与技术层面的偶发路径构建力量相互博弈;也可能借助更大强度的“策略嵌入”行为诱发新一轮的偏离式变迁,在实现自我“解锁”的同时,激发或者吸收技术层面的路径构建力量,进而强化、改变既有技术进步方式。特定技术进步方式内含的抵制效应与转换效应,通过作用于以人力、物质资本为载体的创意发明向科学技术转化、应用与扩散等环节,催生出路径稳定阶段经济增长的主导技术驱动力量。从制度持续变迁形成的“锁定”趋势来看,政治锁定内含的抵制效应往往以待转化创意发明与政治发展战略的匹配程度作为判断标准,阻碍或者促进相关科技的形成、应用与推广;经济锁定产生的抵制效应源自于行为主体综合判断既有经济发展模式下资源分配、预期利润等内容,进而作出的压缩特定科技转化空间的行为决策;认知锁定引发的抵制效应表现为特定文化发展手段运用可能引起的行为主体科技筛选“理性共识”固化。从技术层面的路径构建机会来看,通过蛮横力量直接构造、经济奖惩间接诱致以及共同演化调整三种途径^[1]形成的构建力量,有可能冲击并诱致上层趋于稳定的适宜制度调整路径发生偏离,通过全面“解锁”来扩大战略匹配科技的范畴、调整行为主体的预期利润以及重塑科技转化的筛选共识,进而稀释既有技术进步方式的抵制效应,实现由技术进步框架根本性跳跃驱动的经济增长主导技术动力转换。

3. 经济结构的动态转变促使经济转型路径发生分化

在制度适宜性调整与技术进步方式转换的持续作用下,经济增长数量的相对变动与形态发展的兴衰转化将传导至整个经济系统,促使趋于稳定的经济转型路径逐渐分化,在结构转变的作用下发生路径消解、路径背离与路径突破^[2]。从经济系统的整体性来看,结构层面的转变既可能来自于外部冲击,例如战争、灾害以及先进因素渗入引发的原始经济结构解体,也可能源自于经济系统内部生产率变革等供给因素以及产品收入弹性分布改变等需求因素,共同引发的经济系统某些组成部分的急剧扩张或收缩^[3]。这些结构层面的转变将驱动经济增长与形态发展进入新一轮的非均衡演化,并在选择

机制与创新机制的作用下,以不同方式增强、减弱系统内的多样性特征,形成差异化的经济转型路径分化类型。当多样性特征的改变源自于系统内选择机制为强化既有路径而自发剔除某些组成部分时,“不符合历史趋势”的路径就会被自然消解,既有经济形态也将趋于衰落。当多样性特征的改变源自于系统内创新机制的触发时,根据行为主体在破除路径依赖低效率锁定过程中的认知演进以及供给创新机制的强度,分为修补式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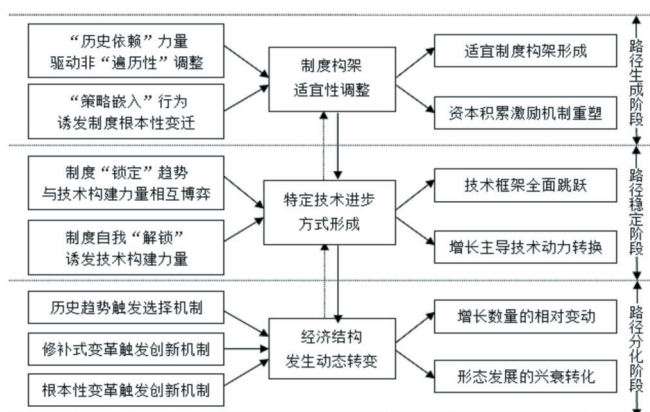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转型路径演化的形成阶段

[1]Rip, A. and J. W. Schot, Constructing transition paths through the management of niche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1. 127-139.

[2]Sydow, J. and J. Koch, Organizational path dependence :opening the black box.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9, 34(4): 689-709.

[3][美]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革与根本性变革,前者引起路径背离以及既有经济形体的异化,后者引起路径突破以及既有经济形态的彻底转型。

三、兴衰探源：路径演化视角下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形成逻辑

从路径演化视角探寻中国经济大转型进程中历次转型的形成机制,首先,要解决路径生成阶段制度适宜性调整下的动态约束条件是如何在时间历程中发挥经济绩效,又是如何在利益群体的理性演进、力量博弈中被修正与选择的;其次,要弄清路径稳定阶段的技术进步方式是如何在创意发明的技术化环节发生作用,并引起增长主导技术动力固化或者转换的;最后,要合理判断创新机制与选择机制在经济系统演化过程中的积极与消极意义,进而把握转型路径分化的阶段性演进特征。

1. 由盛转衰：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路径演化

从较长视域来看,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构架的适宜性调整过程中,尽管变法实验、统治偏好异化等“历史微小差异”确实触发了既有路径选择集内新路径生成的涌现机会,自然环境突变、异族势力入侵等外部冲击也在不断打破已生成路径的锁定趋势。但是由权力更迭、弹性体制供给、农民起义等“有意识”“策略嵌入”行为组成的周期性内卷动力,能够对既有路径选择集进行扩容与修复,通过修补式制度变迁惯性将路径偏离程度控制在封建制度构架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并催生出有利于发展农业经济并缓解马尔萨斯制约的资本积累激励机制。在“维护统一、巩固王权”的政治发展战略下,更易形成以官僚选拔、税源开辟、军事安全为导向的资本积累合法性机会窗口;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强化,能够引致出促进农业经济优先发展的资本积累激励偏好,“外儒内法”杂糅统治文化借助等级意识塑造出的“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等适应性预期,构成资本积累的隐形激励途径。

随着已生成路径趋于稳定,制度修补式变迁的“锁定”趋势通过科举考核引导、专营权管制等途径极大压制了技术层面的偶发构建力量,在不断强化小规模、间歇性技术进步方式的同时,通过放大政治风险、压缩预期利润、创造筛选共识,重点抵制不利于政权维稳、税赋徭役征收、宗法等级巩固的创造发明技术化环节。从时间演进的纵向维度来看,中国主要领域的科学、技术与发明基本产生于10世纪之前,并且多集中在农业、手工业与大一统科技范畴^[1]。需要承认的是,尽管封闭、自我强化的技术进步方式受到边际递减趋势约束,无法内生出创意发明科技化的加速机制,但却为中国古代技术进步框架发生断裂式嫁接以及经济增长主导技术动力转换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内源压力。自明清时期,西洋技术与本土技术的嫁接就逐渐拓展至火炮、钟表等众多行业^[2],但是以血缘、师徒关系为基础的经验技艺传承方式致使这种内源压力始终无法驱动技术改进、扩散能力发生根本性突破。即便是近代技术引进、模仿浪潮的涌现,也只是为了解增长主导技术动力转换的内源压力,区别于能够内生出指数式增长加速机制的西方科技根本性变革。

制度层面“有意识”偏离行为与技术层面偶发构建力量组成的创新机制多在自然灾害、战争动荡时期发挥休养生息、缓解分权风险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封建割据、列国混治的制度实验、市场力量的不规则兴起以及偶发的航海贸易、天文制图等技术变革。这些多样性成分的出现佐证了创新机制在古代经济系统演化中的积极意义。但是受到制度、技术层面选择机制的强行干扰,系统内的多样性成分

[1]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页。

[2]彭南生、严鹏：《技术演化与中西“大分流”——重工业角度的重新审视》，[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

无法累积至农业经济形态的容纳上限^[1]。反复的路径消解与路径背离,最终孕育出了农业经济形态自然衰落与资本主义经济不规则萌芽共存的路径分化特征^[2]。

因此,无论是世界经济周期性运动的历史趋势、文明背景转换可能产生的冲突还是西欧资本主义力量的扩张,都势必引发新一轮封建系统内部创新机制的供给或者移植意愿^[3],进而瓦解农业经济驱动下的传统增长方式。特别是当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数次工业化浪潮将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商业成分、交换关系、资本流动等脱胎于农业经济形态的新兴社会逻辑不可避免的涌现、壮大与强化。在主导文明全面过渡的大背景下,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尽管缓慢、曲折,但却呈现出不可逆的大趋势。

2. 复兴重启:近代市场经济向理性计划经济转型的路径演化

鸦片战争以后,依附于千年政体的官僚、权贵与地主阶层缺乏发动根本性制度变迁的动力,具有较强变革意识的民间仁人志士,却无法控制路径生成的资源与权力,其零散回应组成的“偶然事件”仅仅构成触发既有路径选择集内新路径涌现机会的必要条件。而清王朝旧势力中的开明人士能够在利益驱动下通过“有意识”的“策略嵌入”行为发动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并显化为有利制度供给、工业化模式引入以及相关新政推行,但是其多重身份背后的利益交织不仅能够左右市场规则的走向,而且掺杂着政治权力的争夺。因此,整个制度的适宜性调整呈现出断裂、失衡与不彻底的特征,既无法内生出路选择集以外新路径的创造力量,也无法形成以内源型工业经济为导向、民间力量为主体、均衡推进为手段的官方合法资本积累激励。

过于依赖外部的技术进步方式借助政府在资源控制、技术选择以及产业载体培育环节的主导身份,通过收紧或者放松技术进步的需求、供给环境,形成对非官方合法领域技术化环节的周期性抵制。致使经济增长的主导技术动力局限于不规则的定向模仿以及机器、产品入侵式催化的连带效应^[4]。客观来看,在创新机制的作用下,制造、金融等新兴部门相继崛起,现代管理、通讯方式不断扩散,经济增长也迎来了难得的“黄金期”^[5]。但是随着国家主义的回归,高度捆绑的财政、军事利益借助国家资本、税收制度等选择机制,在挤压系统内新工业、先进技术、新型生产关系等多样性成分的同时,通过阻碍制度、技术与结构层面的良性互动,强行切断了转型潜在路径生成、稳定并分化的链式环节,致使增长表现未能彻底摆脱衰退,而工业化也始终停留在萌芽状态。

新中国的建立拉开了近代市场经济向理性计划经济转型的帷幕,其路径生成的动力源自于“国家重建”理性共识下强烈的适宜制度供给意愿。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决策层对重建目标的革命性判断,汇集成为“顶层设计”下既有路径选择集以外新路径的构建力量,并通过一系列根本性制度变

[1]江南地区的崛起始于10世纪大规模战乱、气候变迁引起的重心南移,为了实现皇权维稳,系统内涌现出了大规模创新机制以鼓励农业技术变革、商业贸易发展与海上军事扩张,但是随着政权、经济的趋稳,系统内选择机制随即被触发、加强,出现了众多强行减弱系统多样性的案例。例如土地转让制度与“亲族优先”习俗阻碍移居行为,政府颁发开采许可证的治理惯性压制了缓解煤炭业生产资源约束的市场途径,以家庭亲缘结构为主的劳动力供给方式排斥工厂发展以及依赖规模生产的技术革新。

[2]王津津、任保平:《重释李约瑟之谜:经济转型路径演化视角下的兴盛与衰落》,〔成都〕《经济学家》2016年第6期。

[3]厉以宁:《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比较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5页。

[4]〔美〕托马斯·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5]根据珀金斯(1984)、罗斯基(2009)等人的估算,中国在1914—1931年的年均生产总值达到2%,投资、消费规模大幅增加,制造、运输、金融等近代部门的增长速度与发展规模均有实质性的突破,采矿业和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4%,同时期的日本、英国与苏联分别为6.6%、4.4%、7.9%。经济结构中制造、运输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值占GDP总额由1890年的0.70%上升至1933年的5.30%。

迁集合予以强制实施,反映为政治制度中集权成分的凸显以及经济制度中理性计划成分的加强。据此衍生出的追赶、重建型政治发展战略促使计划管控式的资本积累激励途径获得官方合法身份,重工业优先经济发展模式内含的倾斜式资本积累激励偏好通过扭曲价格体系、非均衡推进予以显现,而突出“一元”强意识形态的文化发展手段借助政治动员、经验推广压缩个体观念、价值交锋的“公共领域”,形成对资本积累适宜性预期的强制干预与引导。

由一系列选择、确立、调整、改革环节组成的适宜制度形成过程,延长了制度自增强机制向“锁定”状态靠近的时间。特定战略导向、经济模式以及文化手段在激发技术内源需求的同时,通过国家资助、攻关奖励等手段诱致出技术层面的路径构建力量,制度与技术的良性互动促使技术进步方式由近代不规则的外向依赖型转变为大规模推进的定向模仿、引进型,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军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主导技术动力体系。由苏联定向援建、合作协商平台以及多元经济成分共识构成的系统内创新机制,引导工业化与国有化成分迅速累积,并显化为较为完整的工业、国民经济体系。有效破除了近代市场经济后期的低效率锁定状态,促使原本处于不断衰退的经济通过路径突破实现全面复苏。根据官方统计及各方学者的估计,“一五”期间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在15.2%—19.8%之间,处于历史顶峰并远超同期发达国家水平。

3. 高速增长奇迹:行政命令型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路径演化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制度变迁在自增强机制的作用下跃过了“锁定”趋势的临界状态,由引导、改造驱动的理性计划经济转变为激进、不均衡式的行政命令型计划经济。尽管“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初衷在于缓解全盘移植“苏联模式”引发的不良反应,行政分权改革的设想也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但是在政治制度集权成分不断凸显的同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跃进式改革陷入了由“虚假指标”驱动的破坏式调整怪圈,而分权改革也只达到了集权力量下放转移的效果。因此,这些尝试性努力仅仅构成历史路径依赖下制度构架“非遍历性”调整的动力,其内生出的行政命令式资本积累途径无法避免信息失真、滞后调整可能引发的失衡风险,“重量不重质”的资本积累偏好致使投资规模出现扭曲式膨胀以及资源的过度浪费,而“共产风”导向下的资本积累适宜性预期也带来了“免费搭车”的副产品。

伴随着发达国家联合禁运政策的实施以及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已生成路径既无法摆脱制度的锁定趋势,也未能再次孕育出技术层面的构建力量,定向模仿、引进型技术进步方式内含的抵制效应逐渐显现,不仅阻断了以市场、民间为导向的技术需求拉力,也无法获得完整产权、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层级扩散式技术供给推力。而1966年开始的一系列大规模、深层次政治集权运动,在“有效打击并化解集体行动下共谋与既得利益”的同时^[1],成为系统内多样性成分的主导筛选机制,有效抑制了政治局局部调整、经济战略性重建等创新机制可能带来的“民主决策复归”新诉求、“包产到户”新现象以及“部门比例平衡式调整”新思路等多样性成分,过于强大的选择机制致使转型路径在经济的大幅震荡中趋于自然消解,始终未能摆脱行政命令式计划经济范畴内的历史依赖力量。

行政命令型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路径生成动力来自于危机触发下的“顶层设计”力量以及零散风险实践构成的“民间首创”力量,前者通过理论探讨形成重建国家制度与社会、经济秩序的新共识,后者通过示范效应自下而上冲击历史认知刚性,两者共同汇集成为“改革、发展、开放”理性共识下既有路径选择集以外新路径的创造力量。制度构架的根本性调整表现为政治正式制度中开放、民主成分的增强以及行政分权的重启,经济正式制度中市场力量的逐渐引入,非正式制度中“一

[1][美]曼瑟尔·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元”向“多元”意识形态的全面过渡。伴随着价格信号的重塑、微观主体的激活与渐进、平稳推进手段的确立,既有制度构架内生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积累激励途径,实物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存量双优先的积累激励偏好与突出效率思维、契约精神的资本积累适应性预期。

制度持续偏离释放的“解锁”效应有效激发出技术层面的构建力量,并借助“干中学”扩散机制与低成本竞争机制形成制度与技术的良性互动,催生出由“比较优势、市场导向、成本底线”驱动的技术进步方式,通过战略匹配科技扩容、预期利润引导机制重塑与科技筛选范围更新释放出新的转换效应,进而实现增长主导技术动力的平稳、有序过渡。

随着系统内行为主体改革意识的不断加强,以市场双向开放、“放权让利”等长期主动战略性政策以及乡镇企业等新型组织形式为代表的创新机制不断被触发与供给,并借助试点实验、渐进推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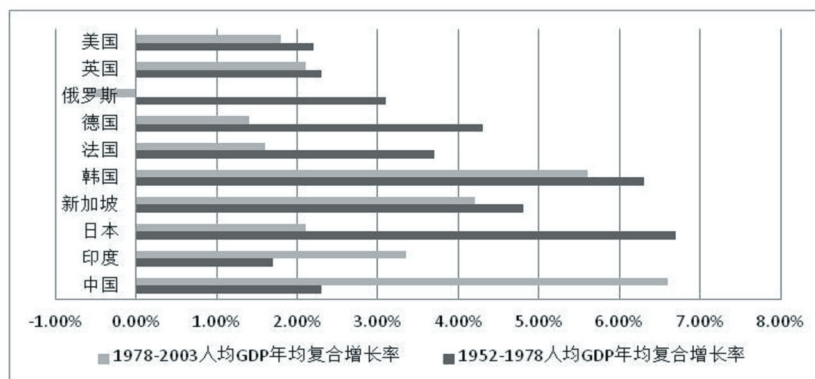


图2 1952-1978年、1978-2003年代表性国家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长率对比

手段,逐渐打破封闭惯性、体制偏好以及行政管控型治理思维等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认知锁定,有效化解了选择机制过度筛选系统内多样性成分的风险。促使经济表现与形态演进在路径背离与路径突破的相互加强作用下,实现了高速增长与平稳转变。

四、历史比较:中国三次重大经济转型路径演化的阶段性差异

经济转型类型的差异构成转型路径演化过程的先天因素,而各个环节的差异在自我演化趋势以及国家干预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被积累与放大,汇集成为超长期视域下经济大转型进程中具有内在关联的中国式进化轨迹。

1. 中国三次重大经济转型路径生成阶段的比较

从路径生成的驱动目标与触发因素来看,历次转型均是特定目标导向下外部发展趋势、重大特征事件以及内源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不同目标下触发因素的从属关系与具体功能有所差异。其中,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构架高度稳定、相对封闭的特征,决定了不断积累、转化的内源压力是赶超目标萌芽驱动下第一次转型路径生成的先行主导因素。外部发展趋势通过不规则的合法性机会窗口重新放大不断被消解的内源压力,而重大特征事件则通过修正行为主体的认知结构创造出新的内源压力。第二次转型作为社会根本性变革在经济层面的反映,其路径生成是重建式赶超目标驱动下内源压力与重大特征事件共同主导的结果。前者通过扩大理性认知共识激发并汇集各方主体的路径构建力量,后者触发“维稳—赶超”目标权衡下路径涌现机会与构建机会的重新分布。由世界经济分化趋势、地缘政治演变以及多样体制竞争性演进构成的外部发展趋势为路径生成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必要的经验范本与决策依据。第三次转型具有自我优化的特征,其路径的生成是在实现速度赶超目标下外部发展趋势与内源压力共同主导的产物。前者借助先行增长国家的示范效应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创造路径构建的良性收益预期,后者通过“民间首创”触发、“顶层设计”跟进的压力释放渠道,在反复的试错与修正过程中不断放大认知演进的“重叠共识”。重大特征事件引发的挑战与机遇尽管具有不确定性,却提供了内源压力与外部发展趋势相互协调、形成合力的重要契机。

从路径生成的具体方式与复杂程度来看,历次转型的路径生成过程均属于制度适宜性调整的阶段性产物,但是调整方式及其呈现出的复杂特征具有明显差异。其中,第一次转型路径的生成是路径构建力量反复消散与聚集的过程,始终受到既有制度构架内历史依赖力量的不规则压制。因此,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既不彻底也不平衡,其复杂性体现在路径生成过程中构建力量与依赖力量之间的强烈对抗与频繁博弈,显化为“锁定——路径创造——解锁——路径依赖——再锁定”过程的持续反复。第二次转型路径的生成是理性设计、演绎驱动下一系列根本性制度变迁集合组成的实践过程。制度构架的适宜性调整既涉及新制度对旧制度的全面替代,也涵盖了后续的自我修正、强化等环节。前者是决策层构成的新路径创造力量通过强制推进与政治动员,整体、迅速、非衔接式地创建、移植计划体制,后者表现为集权与分权的反复纠葛以及模式移植样本的扬弃与复归。由于路径生成过程的控制力量过于集中,既定目标下认知演进的僵化趋势始终无法获得其他路径构建力量的解锁冲击,致使路径生成过程陷入了“锁定——路径偏离——再锁定”的被动调整过程。而第三次转型路径的生成是由制度实验与理论探讨共同驱动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充分反映了学习效应以及试错、模仿、修正等实践经验在制度进化中的积极意义。政府主导而非全权控制的运作模式既能够保证其在重大事件上的决策执行力,也能够为“顶层设计”以外的路径构建力量成长创造较为宽松的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径“创造性”构建过程的复杂性表现为,需要同时解决既有行为协调机制失效可能引发的制度混乱危机以及新旧制度断层可能出现的制度荒原现象^[1],具有“解锁——路径创造——再解锁”的主动调整特征。

2. 中国三次重大经济转型路径稳定阶段的比较

从路径稳定阶段特定技术进步方式形成的驱动力量来看,均来自于制度构架持续变迁与技术层面偶发构建力量的共同作用,但是动力构成的从属关系与演进过程有所不同。其中,第一次转型特定技术进步方式的形成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缓慢解锁孕育出的技术移植意愿。封建制度构架修补式变迁的不规则作用释放出了技术层面偶发路径构建力量的成长契机,促使小规模、间歇性技术进步方式以外的突破型技术进步方式得以萌芽。随着制度变革意愿的不断加剧,制度与技术的共同演化又孕育出了自上而下的技术层面构建力量,即清政府开明人士借助官办产业发动技术模仿与引进浪潮。第二次转型特定技术进步方式的形成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构架的根本性调整。一方面,通过强制路径直接构建的方式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技术层面构建力量,表现为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技术模仿、引进行为;另一方面,借助经济奖惩不断地诱致出自下而上的构建力量,表现为国家研究、资助平台对国防工业、基础科学的倾斜式支持。第三次转型特定技术进步方式的形成动力来自于制度变迁与技术偶发构建力量的协同演化。具体表现为认知演进驱动下的持续“策略嵌入”行为在不断打破制度变迁“锁定”趋势的同时,诱发出技术层面的构建力量并进行新一轮的制度“解锁”冲击,从而在技术进步方式转换过程中创造性地引入了“比较优势、成本底线以及内外市场”三大驱动原则。

从路径稳定阶段增长主导技术动力转换的形成过程来看,第一次转型特定技术进步方式的形成,是在小规模、间歇性技术进步方式的基础上直接建立外部依赖型技术进步方式,以农业、手工业与大一统为技术框架的增长技术动力除却自身的演化趋势之外,并未受到实质影响。直至甲午战争之后,传统技术框架下的增长技术动力才真正受到冲击^[2]。以重工业、轻工业为技术框架的增长技术动力借助引进、模仿渠道快速崛起,并出现了区域、产业分布不均衡,内源技术进步动力不足以及恶性竞争引

[1][匈]雅诺什·科尔奈:《后社会主义的转轨思索》,[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2]高文杰:《历史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转型——16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回顾与反思》,[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发技术进步中断等现象。第二次转型增长主导技术动力的转换与第一次转换具有一定的衔接性,表现为模仿、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的延续以及对工业范畴技术进步的重视。但是受到特定技术进步方式形成动力的影响,第二次转换具有明确的计划性,反映为大规模推进与重工业、军工业领域优先的转换思路,在对农业、手工业等增长技术动力形成过度挤压的同时,相对增强了地缘政治危机驱动下的内源技术进步动力。第三次转型增长主导技术动力的转换是在顺序推进原则下进行的,通过平衡复归技术进步的发生领域、构建技术供需的内外市场动力、重塑技术进步的微观激励机制以及加强开放创新、成本底线意识予以实现,整个转换过程相对均衡、有序,未出现大规模反复与不规则动荡。

3. 中国三次重大经济转型路径分化阶段的比较

从路径分化阶段系统内多样性特征的改变方式来看,同时受到选择机制与创新机制的作用,但是触发过程与作用强度有所差异。其中,第一次转型系统内多样性特征的改变,是选择机制与由修补式变革触发的创新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制度锁定趋势与技术抵制效应的共同作用大于制度自我解锁与技术转换效应的共同作用,构成时间、地域维度下农业经济系统结构转变驱动力量分布的大概率状态。选择机制的非持续作用与间歇性的路径背离,促使多样性成分积累至经济系统结构转变的临界点,并顺利开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缓慢转型。第二次转型系统内多样性特征的改变是创新机制主导的产物,由行为主体整体推进的根本性变革,促使系统内以集权、计划为核心的多样性特征迅速累积至既有经济系统的容纳上限,在土地改革、资本改造等手段的作用下,迅速瓦解的选择机制无法对多样性特征突变作出有效修正,计划经济对近代市场经济的替代迅速而彻底。第三次转型系统内多样性特征的改变与第二次类似,均是在创新机制的主导下完成的,区别在于创新机制的触发来源包括修补式变革与根本性变革两个部分,多样性特征的改变呈现出相对缓慢、可持续的特征。受到行为主体认知演进与既有利益格局的双重约束,根本性变革发动者有可能转变为修补式变革发动者并陷入多重锁定下的路径依赖状态,系统内的权力制衡机制、多样化的变革手段以及试点推广的经验途径能够修正行为主体的认知、打破趋于固化的利益结构,重新汇集根本性变革力量并触发系统内的创新机制,从而消除变革僵化、保障多样性改变的可持续性。

从路径分化阶段经济结构转变的实际效果来看,历次转型均伴随着数量表现与经济形态的巨大变化,但是在发生范围、可持续程度与转变路径上存在差异。第一次转型的经济结构在数量变化与形态兴衰方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即农业经济形态的衰落引发增长表现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成分与工业经济形态的不规则萌芽带来了小规模、不可持续增长机遇。路径分化阶段的自然消解力量大于背离力量,致使增长绩效与形态变化不可避免的落入由盛转衰的发展道路。第二次转型的经济结构转变源自于突破性路径的出现,而经济形态的变化先于增长数量的相对变动,即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计划经济经济形态转换目标间接驱动了增长表现的快速复兴。但是随着认知的不断演进,发动根本性变革的相关主体逐渐转变为既有利益格局下选择机制的触发者,增长表现与经济形态也随之落入反复震荡与日趋僵化的转变路径,呈现出不可持续的特征。第三次转型的经济结构转变是行为主体同时借助修补式变革与根本性变革不断触发系统内创新机制的结果,其增长表现与经济形态呈现出协调演进的特征。较前两次转型相比,由局部到全局的渐进式转变道路有效保证了路径背离与路径突破相互加强过程的稳定性与有序性,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呈现出质的飞跃,同时还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形态与市场经济形态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结构转变的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五、结论及中国经济转型道路的历史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包含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从理论上来看,制度构架内含的适宜性调整动力,赋

予路径涌现机会与构建机会差异化的概率分布,并通过特定的制度变迁方式,显化为不同的路径生成过程。制度变迁“锁定”趋势下行为主体借助“有意识”偏离行为作出的自我解锁努力,以及技术层面偶发构建力量对已“锁定”制度构架的有效冲击,共同构成路径稳定阶段技术进步方式与增长主导技术动力发生根本性转换的关键。系统内特定选择机制、创新机制的触发与力量博弈,会在影响经济系统内多样性成分改变的同时,促使已稳定路径发生进一步分化,并孕育出下一轮转型路径的生成力量。从现实上来看,中国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历次重大转型,都是路径生成、稳定与分化的链式反应过程,只有当制度适宜性调整、技术进步方式转换与经济结构的动态转变相互继起并形成合力时,经济转型才能顺利实现。不同时期增长表现的兴衰变化是中国经济长期转型演进逻辑下的必然产物,同时构成新一轮经济转型思想模型继承、修正与创造的现实因素。经济转型路径演化的阶段性差异,既是时间维度下人类理性认知、经济发展规律以及经济系统内外不规则冲击在关键节点上的个性化反映,也是中国式经济转型路径演化不同阶段矛盾生成与消解过程的多样化表现。为此,我们得到了如下启示:

启示一,经济转型是历史发展趋势与人类理性演进共同作用下的路径演化过程,具有连续、多样与非均衡的特征。不同经济转型之间的内在逻辑体现在时间维度下制度适宜程度认知、技术进步方式选择、经济结构转变效果的创造性继承,但是继承与创造的力量博弈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任何时期经济转型的路径演化都不是孤立、单一与静止的,需要借助长期视域与动态演化思维,合理辨识经济转型的时代价值、厘清转型内在逻辑与外在表现的进化趋势、尊重创造性继承的历史规律,才能形成以中国经济转型道路为依据的新理论与新经验。

启示二,经济演化规律刚性界限下各方行为主体认知、利益演进的冲突与调和,构成经济转型矛盾反复生成与消解的深层原因。经济转型的路径演化过程总是伴随着矛盾的生成、累积、消解与转化,而政府作用、群众共识与经济演化规律的协调程度,能够通过影响矛盾运动的方向与结果,阻碍或者加速经济转型。因此,政府作用既不能逾越经济演化规律的刚性界限^[1],也要综合考虑行为主体的认知共识与利益诉求;群众共识的达成与利益冲突的化解,有赖于经济演化规律的认知更新、特定利益预期的创造以及政府引导能力的培育;经济演化规律的经验总结与创造性转化,有助于群众与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加强上下联动、形成推进合力。

启示三,构建包容性的适宜制度构架、重塑经济增长的主导技术动力与实现经济结构的良性转变,是经济转型顺利进行的必备要素。其中,适宜制度构架本身及其内含的政治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模式与文化发展手段可以是多元的,但是三者为目标导向、运作途径与实际作用上应保持协调兼容与相对平衡。技术进步方式的选择能够驱动特定时期经济增长技术动力的重塑,制度有效解锁与技术层面路径构建力量的激发,是破除既有科技范式路径依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行为主体变革意愿的增强与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激发选择、创新机制释放出特定的结构转变效应,在引导多样性成分改变的同时,提高数量表现与形态发展适宜性演进的可控程度。

启示四,改革、发展理念下理论探索与经验实践的创新结合,有助于重构经济转型的思想模型、消除转型实践的不确定性。系统外部的不规则冲击与系统内部的矛盾演化是经济转型不确定性生成的主要根源。制度创新与制度试验相结合,有助于降低经济转型地方推进过程中改革阻力、发展冲突诱发的高昂成本与失败风险。技术创新支持体系建设与实践主体培育相结合,既能够降低基础科研、技

[1] 靳涛:《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演进与理性——二十世纪两次逆向经济至转型比较研究及理论反思》,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术创新与成果市场化垂直链条的断裂风险,也能够有效激活企业家创新、风险意识,重塑多元化企业创新主体的横向竞争动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实践性调整相结合,有助于在战略层面提高结构调整的均衡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并通过实践层面的经验反馈形成结构优化的倒逼机制。

启示五,开放系统下的多方位互动,能够为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修正提供新契机与源动力。封闭经济系统向开放经济系统的全面转型,构成中国经济由衰微到复兴过程中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必不可少的力量源泉与现实支撑。开放系统下源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方位互动,不仅为转型增长所必须的制度调整与技术进步提供了模仿、移植与创造性转化的有利契机,还能够借助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联互动,在双向市场力量与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取规模经济、“全球化红利”以及技术、结构优化的倒闭机遇。为破除路径生成的僵化趋势、降低路径稳定抵制效应的不良反应、加速自然消解路径发生背离与突破,创造出了开放理念演进下的外部源动力。

参考文献

1. [美]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美]达仁·埃塞姆格鲁等:《制度: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南京]《南大商学评论》2006年第3期。
3. [美]德西铂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936-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4. [美]曼瑟尔·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 [美]托马斯·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美]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7. [匈]雅诺什·科尔奈:《后社会主义的转轨思索》,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 贺新元:《辩证思维下的“中国道路”解读》,[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
9.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 彭南生、严鹏:《技术演化与中西“大分流”——重工业角度的重新审视》,[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
11. 王津津、任保平:《重释李约瑟之谜:经济转型路径演化视角下的兴盛与衰落》,[成都]《经济学家》2016年第6期。

[责任编辑:天 则]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h Evolution: Vicissitude Retracing and Historical Comparison

Wang Jinjin Ren Baoping

Abstract: By applying the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 technical progress — structural conversion” into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fundamental drives of changes in economic growth.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chances for path construction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 may be conceived in stages of path generation, path stability or path differentiation; however, their joint force is key to smooth actualization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phase differences of path evolution are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gressive logic and accumulative effects pertained in transformations. In addition, coordinating benefits and cognition, combin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in an open economic system, are the historical inspirations of China's long-term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path evolution; comparison of transition; appropriate institu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tructural conversion